

◎盛世华光

那火烫的红色记忆

蒋 巍



福建，仿佛一座巨大的茶台。上面青山如海，绿水如带，云雾缭绕，雨帘如丝。伸手一抓，就是一片白云和几缕茶香，在手心里久久不散，引来阵阵鸟鸣，把个千山万水叫得分外青翠。此来三明，我发现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摆着一张茶台。三五亲友围坐在一起，无论谈家国大事还是工作生意，都是在袅袅茶香中进行的。好安恬好惬意的日子啊！

三明市，一片热血激扬的土地，红军长征4个出发地之一。这里到处布满“闹红”的故事，走近那些鲜活的生命、奋发的青春、在困苦中勇往直前的历程，总是让人激动不已。

风展红旗如画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出击，在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后，一路转战到福建的龙岩、三明地区。1930年春天，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形成，并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广大地区，党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各县、乡的农会如雨后春笋般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办起来的，还有数百所“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党和红军获得了广大贫苦群众的热烈拥护。

那时福建山区生产力极端落后，农民家徒四壁，尽管艰难如此，当时三明地区却仍然每年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募集“千担纸、万担粮”和数十万钱款，提供了有力的兵源、粮源和财源保障。农民踊跃报名当红军的热潮源源不断，仅宁化县就有过万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并组成了“宁化模范团”。国民党军惊呼三明的红军“越打越多”。这期间，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在三明地区留下许多传奇故事。日夜行军打仗，敌军围追不止，穿行在群山中的毛泽东依然意气风发，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在马背上吟成《如梦令·元旦》。在第二次反“围剿”取得五战五捷之后，又挥毫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有“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句，道出苏区“风展红旗如画”的壮丽景观。

1933年下半年，连吃败仗的蒋介石又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实施“铁壁合围、步步为营”的第五次“围剿”。此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

况，一味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和消耗战。经过近一年苦战，红军遭受巨大牺牲，革命事业危在旦夕。1934年10月中旬，主力红军8.6万人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被迫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中有福建子弟兵近3万人。

红军上路后，连连突破敌三道封锁线，接着便遭遇了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面对部署在湘江东岸的40万国民党军，渡江大战进行了四天五夜，红军战士大部分壮烈牺牲，江水为鲜血染红。事后当地老百姓掩埋了上万具烈士遗体，两岸号哭惊天，苍天为之落泪。渡过湘江后，8.6万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战斗中，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不足千人，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毫无惧色。师长陈树湘的肠子被打出来了，他不愿当俘虏，用双手把肠子扯出来慷慨赴死。五团团长易荡平身负重伤，不能行动，命令警卫员对他开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不肯也不敢，他遂抢过枪对着自己的头开了一枪。100团团长韩伟和6名战士被敌人逼退到轿顶山山头，毅然纵身跳下20多米高的悬崖。所幸韩伟和3名战士被树枝挂住，后来历经千辛万苦重返部队。著名的“少共国际师”成立于江西宁都，是由一群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红小鬼”组成的武装部队，萧华（《长征组歌》作者）任政委时才17岁。湘江战役中，该师以血肉之躯保卫湘江界首渡口，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成功地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为红军战略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损失惨重，屡建奇功的少共国际师不得不于1935年2月撤销编制。为掩护主力渡江而身陷重围的红三十四师被困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就义，被称作“绝命后卫师”。

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国民党军对三明地区进行了疯狂残酷的报复，焚毁村

庄，烧毁房屋，灭绝上万户，导致当地人口锐减。即便如此，三明各地留下来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长达3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痛哉！肃立在烈士陵园的墓碑前，我不能不热泪长流。行走在三明的山水间，我不能不放松自己的脚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渗透着烈士们的鲜血和乡亲们的眼泪啊！

红军标语博物馆

这一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博物馆，2013年建立，地点在三明市所辖的永安市洪田镇马洪村。这里背靠青山，紧傍国道，村前广场立有一块巨石，上书“中央红军村”5个大字，道边是一片碧绿的荷塘，环境清丽而静谧。村中的廖氏祖宅有三堂六厅、两书院、四横厢、两大坪，碧瓦飞檐的大门上书写着“逢源”两字，现在为博物馆主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多支红军的机关单位进入洪田镇，有少共国际师指挥部、红一军团指挥部、红军医院、东方军一部等等。当时各级党政军把标语漫画视为宣传动员群众的“第二武器”，各机关、部队都没有专门的宣传干事，不肯枪不打仗，只负责刷标语，对标语内容和写法也有严格规定，如“署名一律署‘红军’二字”“不要写草字、省笔字，不要性急乱涂”等等。后来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当时就是一名宣传干事，他拿着笔提着桶，把红军标语从中央苏区一路刷到陕北，“累了就躺在地上歇一会儿，然后再去捧部队。”现为洪田镇副书记、大学生出身的余君对我说，“闹红”期间，整个三明地区的大街小巷、村村镇镇甚至民居走廊、屋内，到处用黑墨或白粉刷写着红军标语和漫画。洪田、小陶两镇成为标语最为集中也保存最多的地方，总计500多条、万余字。红军长征

离去后，白军反扑，老百姓纷纷用抹泥刷粉的办法把这些标语口掩盖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见天日。

我一个展厅看过去，其中有“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等等。时过近百年矣，墙上的标语尽管已字迹斑驳，党的火热初心和当时的战斗目标却赫然在目，铿锵有声，让先烈的呼吁和历史的回响永久激荡……

珍贵的军用号谱

在气势恢宏的宁化革命纪念馆，一份油印的、已经发黄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静静摆放在玻璃柜中。这是全国现存的唯一一本保存最为完整、刻版印刷的军用号谱培训教材、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军号是军队指挥员的“喉舌”，是“号令三军”调动指挥部行动的信号。1931年秋，15岁的三明籍红军战士罗广茂被选派到司令部学习吹号。结业时，首长把一份号谱郑重交到他手上说：“小鬼，这可是红军的最高机密，你扛得起吗？”小罗答：“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结业后，他带上这份号谱，来到朱德军长身边当了司号员。后来多次工作调动，他始终将号谱带在身边。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小罗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不得不留下。军号被炸坏，他只好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珍藏起来，你好后只身前往寻找部队。新中国成立后，罗广茂终于回到家乡，他曾多次询问母亲，那份号谱还在吗？由于年事已高，母亲想不起来藏哪里了，怎么也找不到。直到1974年，年至花甲的罗广茂在拆建谷仓时，发现一件用油纸包裹的东西倒钉在谷仓底板上。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这正是他魂牵梦绕了整整40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还有那只已经锈黑的号嘴，老罗激动得跌坐地上，痛哭失声。过后，他把这份珍贵的号谱和号嘴，捐献给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复制件展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三明市12个县（市、区）都是中央苏区县，共有300余处红色遗址。寻访拜谒之间，我的心灵总是沉沉的痛痛的。望苍茫茫群山逶迤连绵，默默耸立，多少烈士忠骨长眠在大地之下，有谁能数得清？今天，新时代新生活在高楼林立的三明迸射着绚丽多彩的光芒，白天车流如潮，入夜华灯齐放。我多想向先烈们倾诉人民对他们的思念，诉说今日三明的繁盛、美丽和飘着茶香的岁月静好。



马渡关民歌新唱

曹文润

阳春三月，我去了一趟宣化县马渡关镇，收集“听马渡民歌，看乡村振兴”创作素材。这是我第二次去宣汉马渡关。

马渡关地处川东达州宣汉县东北部，自古为巴蜀取道中原的通道要道，东汉即设“马渡关”，因传说三国猛将张飞跃马渡沙溪河而得名。我国第一首飞向太空的歌曲《康定情歌》的作者李依若故乡就在马渡关。

时光荏苒，第一次去马渡关，不觉已有30多年。记得那是个寒风凛冽的腊月天，我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毛头小伙子，单位派我去马渡关镇出差。我搭乘长途班车，车厢里很拥挤，刺骨的风不断从缺损的车窗缝隙灌进来，抽打在脸上。

好在中午到了马渡关。来车站接我的老张，40岁出头，瘦瘦的脸，八字胡，小小的眼睛很有神。老张待人热情而耿直，干事利索。他先领我去一家小餐馆吃了面条，又领着我在乡场上的小街转了一圈。小街上沿街开着各种小店，那天似乎是赶场天，很是热闹，村民们背的背、挑的挑，带来农副产品和粮食蔬菜，汇集在乡场上做买卖。

办完事离返程班车发车时间尚早，老张又领我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坡，他指着山脚下那一大片被树木掩映的奇石怪岩，向我如数家珍地介绍三国古战场、白莲教遗址和荔枝古道的传说典故。临走时老张对我说：“小曹，你都看到了，我们马渡关这条件，又苦又穷。但我想只要勤劳肯干，一定会变好。到时欢迎你再来作客。”我当即答应一定会再来马渡关。

自从那次马渡关出差后，我就和老张失去联系。偶尔，我也会想起马渡关，想起老张那双炯亮的小眼睛。30年过去了，如果老张还健在，应该步入老年了。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我的老师谭力创作的电视剧本《跑马溜溜的山上》得知，《康定情歌》这首歌曲的背后，原来还有作者李依若一段曲折凄美的爱情故事。马渡关就是情歌王子李依若的家乡是若干年

后我从报上看到的，当时我很激动。我眼前闪现出老张的模样，想起分别时他曾邀请我再去马渡关，心里暖暖的。我总想，要是能再见到老张该多好。

那天，当我来到马渡关镇，惊喜地发现如今的马渡关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旧模样，它已被当地政府和勤劳的马渡关人民打造成“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川东民歌之乡”“康定情歌之乡”“人人皆能随口而歌的独特魅力”。如今马渡关人唱的民歌，都是对脱贫致富奔小康幸福生活的由衷赞美，抒发的是新时代中国农民对乡村振兴美好愿景的共同心声。

川东民歌400首，马渡关曲200多首。马渡关还是著名民歌《苏二姐》的发源地。我想，乡村振兴，必先文化振兴。宣汉县提出“文旅靓县”战略，深度开发民歌资源，擦亮民歌名片，推动文旅融合，绝对是睿智、有远见的选择。也正因此，马渡关镇成为川东大地众多乡镇明珠中最耀眼的一颗。如今美丽富饶的马渡关就像一只涅槃重生的凤凰，在乡村振兴的希望田野上展翅飞翔。

离开马渡关返程途中，我望着车窗外的新农村景色，为没能再次见到老张有些遗憾，却更为亲眼目睹老张的家乡马渡关的美丽蜕变感到欣慰。

那是1993年春节前的一天，听从舅父的安排，我从家乡雷州半岛坐上了通往深圳的长途汽车，辗转10多个小时，来到了深圳宝安。

这里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舅父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10多年，算是最早的那批来深建设者。他说，你在大学里念的是经济学，就该来深圳探探水。这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却从未想过与宝安的缘分早已镌刻在命运之中。

舅父是个忙碌的生意人，早出晚归。平时我就当他的跟班，跑跑腿，打打下手。他说，人啊，在深圳忙不死，只会懒死。有时没事，他便让我到外面走走看看，熟悉一下城市的环境，也算增长一点见识。

那天，我溜达到他家附近的一座新工业区，厂区的围墙还在建造中，正值中午下班时间，工人们穿着整齐统一的工服，一群群簇拥着走出大门，直奔食堂。这是一张张青春、朴素的脸，甚至还显得稚气，他们大多与我年龄相仿，有的甚至比我还小，但却显得沉着而有朝气。看着他们，我不禁想起了我二弟，他中专毕业那年也只有18岁，同样汇入了来宝安打工的洪流。他打工微薄的薪水，有一部分就是我大学读书的生活费。他们是一样相像，每个青涩瘦弱的身影背后，都是一个负重的家。这是青春的痛楚，也是青春的责任。

这个工业区大门口左侧的垃圾堆吸引了我的注意，在零乱的杂物中，我发现有很多废弃的泥塑公仔和音乐盒。走上前去捡起几个，我才发现这些小工艺品还是全新的，不由惊呆了。一名女工走过来对我说，这是她所在的工厂生产的，都是出口货，品检标准高，只要存在一点小瑕疵，都会淘汰，堆在这里成了无用的垃圾。在那个年代，大学校园里流行做点小买卖，算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目光一闪，想着如果把这些小玩意带回学校去，必定是畅销货。我立马给二弟打电话说了我的想法，他二话不说，就给我找来了两个大麻袋。我俩像探宝一样，猫在垃圾堆里忙活了两个多小时，竟然收捡了鼓鼓两麻袋的工艺品。10多天来，我带着几个要好的同学在我就读的校园摆起了货档。果然不出所料，这些小公仔颇受欢迎，我们共卖了1000多元。在那个年代，这算是不小的数目了，算是我人生赚到的“第一桶金”。在这批“废品”中，其中一个音乐盒至今仍存放在我家，时光已穿梭近30年，其音质依然纯净得似乎一尘不染，足以见证深圳质量的不同凡响。

1995年，我带着梦想，来到了宝安，也有了一份较稳定的工作。那时二弟也刚换了一份新工作。说起他的求职，还是一段有意思的经历。当时，他求职会计，老板问他月薪要多少钱，他说现在先不定，干一个月后再定薪。一个月后，老板不但将他留了下来，而且给了令他非常满意的薪金。二弟在这家公司干了就是27年，现已成为公司的高管。这家公司换了三位老板，他始终是每一任老板最信任的员工之一，也是这家公司最忠诚、最勤勉、执行力最强的企业管理者之一。他对我说，像他这样在这家只有500多人的公司服务超20年的员工就有40多人，很显然，公司已成为他们心中的另一个家。也是从那年起，我像上紧的发条，在宝安的时间和空间中辗转。

宝安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我在两年之后更坚定了在此安居的决心。1997年底，我在宝安购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算是在这里安下家，心也安定下来了。几年后，父母亲陆续来到了宝安生活，我们家便也成为众多来深求职的乡友最初的落脚点。有时来人太多，到吃饭时间，站着围桌用餐便也成为常有之事。二弟统计过，这些年来，外出求职在我们家暂住的就有100多人，至今仍留在宝安工作生活的有三成多。

宝安是深港文化之根，早在东晋咸和六年，这里已由中央政府设县管理。上世纪改革开放的浪潮迭起，“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宝安人，令这古老的土地华丽嬗变，焕发出了蓬勃生机。而今天，迈入湾区时代的宝安，正秉承城市发展的内核，沐浴湾风海雨，把握时代的脉搏，走出自己强劲有力的节奏，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城区。

对于很多踏上深圳追逐梦想的年轻人来说，宝安是无数来深打工者开启梦想的地方，几乎每个人都与它有一段或长或短、或悲伤或喜悦的故事。宝安，古时因境内有一山名为宝山，山中有银矿，明朝有书载：“得其宝者安，凡以康民也。”故而得名。在我的理解中，这是因为众人都从它这里收获一块或者多块属于自己的宝，这也是这座城市送给每个人几乎平等的那一份，或忠诚，或勤干，或诚信，或坚韧，或机遇，无论他最终离开，还是留下。

我们是属于留下来的一群，在20多年的时光里，这里已有了故乡一样的熟稔。就我们而言，健康的父母亲是我们的镇家之宝，一个“勤”字，是我们的立家之宝。我们愿意真诚拥抱这“二宝”，得宝而安居，怀宝而乐业。



得宝而安

孙善文

母爱如水

倪娜（德国）

现代生活正以超人的速度进步，身在海外客居漂泊，与亲人联络有手机微信、网络电话，因及时、快捷、人性化、便于操作，老少皆欢，爱不释手。

自从妈妈也有了手机微信，我们经常沉迷于手机里流连问安。母亲身体硬朗，早晚出门散步，闲暇舞太极剑，比上班族还要充实忙碌。我发现母亲的心态远比我还年轻，乐观向上，情绪比我还好，从容洒脱，当年的文艺青年如今还文采依旧。我与母亲像朋友一样谈天说地，分享人生感受，一起追忆逝去的岁月，拾起记忆里珍贵美好的一串串贝壳。

母亲教师出身，她与父亲结婚时，还是个满脑子充满梦想、喜欢音乐、爱跳舞、爱文学的文艺青年。婚后先后有了我们四姐妹，她的梦想从此被锅碗瓢盆所取代。白天上班忙于学校里的学生，晚上还要疲惫地照顾自己的孩子。

父爱如山，母爱如水，父亲的吃苦耐劳、诚恳豁达，母亲的勤俭持家、乐善好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那时，要凭票证购买限量粮食和副食及日用品，我家有个菜园子，应季小菜基本自足，家里饲养鸡、鸭、鹅、兔以补肉蛋不足。

记忆犹新的一幕幕：用沉重的铁水桶远道挑水喝；用大斧子劈柴、砸煤；用火炕、火墙取暖；蹲坐在地上用搓衣板在大洗衣盆里洗衣服；棉衣、棉裤自家手缝制。出行无论多远，几乎都是靠步量，后来家里有了自行车，爸爸的自行车上坐满我们姐4个，像杂技一样令人开心陶醉，那是我们在一起最愉快的时光记忆。

记得那时家家都有干不完的家务活，有时我半夜起来看到：母亲还在地

上洗永远洗不完的衣服，在缝纫机上轧永远轧不完的针线活儿。母亲做事认真，经常拆了缝，缝了又拆，为赶制一条棉裤通宵达旦。母亲在昏黄灯光下的神情依然在我眼前晃动。

母亲含辛茹苦，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事事以孩子为中心，孩子从来没离开过母亲的手心。如今我们长大成人离开家，越走越远，她总是理解支持。我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她心的磁场，她依然不远万里捎来在她眼里好看的服装鞋帽、她爱吃的中国食品，因为她爱吃，所以我们也一定爱吃，那是她的母爱逻辑。提起我们姐妹4个大学生，一直是她心中的骄傲自豪。

自己有了小家也成为母亲后，生活繁忙，电话便代替了与母亲的相聚，很少静下心来倾听母亲的心声。总以为母亲还好，她那么乐观、开朗，不需要我们照顾和担忧，倒是我们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都向她倾诉。

已成人的儿子，今年第一次张罗去饭店为我去过生日，令我感动。我这才懂了做母亲的心思：哪一个母亲不期待与儿女们在一起呢？在过生日、节假日里团聚，那是母亲最大的期待。每当我们对母亲说工作忙、学习忙、家庭忙，忙于那永远忙不完的事情，母亲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忙去，我最不爱过生日了”。我们总信以为真，原来母亲也会善意地说谎，母亲总是能体贴、理解她的孩子。

思想家是每个海外游子永远的牵挂，无论我们异乡漂泊有多远、有多久，家乡味——母亲做的饭永远是游子最爱和舌尖上的想念，母爱的广阔胸襟、无私奉献，是多么圣洁。

古有韩信遭困得助于漂母慷慨解囊，韩信立志图强知恩图报，传为千古佳话，演绎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母爱仁慈、博爱之美德，如一幅博大精深的母爱图画根植在中华儿女心中。中国人无论浪迹何处，爱母亲爱祖国，感恩回报社会，永远是他们坚守的价值观和做人的根本。母亲在家即在，我们与母亲血脉相通，母亲的安康就是在外游子最大的慰藉和福祉。祖国就是游子最强大的精神母亲，我们与祖国息息相通，祖国国泰民安，就是在外游子最大的自信和骄傲。